



拯救工党

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

[英] 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 著

张浩亮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THIRD MAN
LIFE AT THE HEART OF NEW LABOUR

THE THIRD MAN
LIFE AT THE HEART OF NEW LABOUR

拯救工党

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

[英] 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 著
张浩亮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 / (英) 曼德尔森著；张浩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300-17969-8

I. ①拯… II. ①曼… ②张… III. ①曼德尔森-回忆录 IV. ①K835. 6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0580 号

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

[英] 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 著

张浩亮 / 译

Zhengjiu Gongdang: Yu Bulaier Yiqi de Zhengrong Suiy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印 张 20.25 插页 1

字 数 311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 谢

几年前，刚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以为将自己的想法诉诸笔端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不久之后我便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它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以下这四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我根本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首先要感谢的人就是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在我过去 20 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断地敦促我要坚持写日记，并且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其实，多年来我一直酷爱记笔记并且还有偶尔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决定向所有人隐瞒这件事，默默地坚持写作。这本书就是我笔耕不辍的成果。我非常感谢罗伯特多年来的坚持，还有吉尔（Gill）以及他们整个家庭对我的关怀与帮助。

其次要感谢《观察家报》（*Observer*）的前首席政治记者内德·特姆科（Ned Temko），是他使我相信自己可以完成写书这项工作，并且他始终以独到的见解和巨大的支持为我开始这项工作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另外两个同样必须要感谢的人是本杰明·韦格-普罗瑟（Benjamin Wegg-Prosser）和帕特里克·洛克伦（Patrick Loughran），他们分别是我在 1997 年和 2010 年结束大臣生涯时的特别顾问。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才，无论是与本杰明还是帕特里克在一起时，我始终不能确定掌控全局的到底是我还是他们，但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这本书所描述的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我都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毫无疑问，我对这本书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我还要特别感谢尤利娅·韦格-普罗瑟（Yulia Wegg-Prosser）和维多利亚·奥伯恩（Victoria O'Byrne）提供便利，让我占用了本杰明和

帕特里克很多时间，并且受益良多。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彼得·鲍尔 (Peter Power)，他同时也是我的发言人。感谢彼得在校正阶段读了这本书，并像近年来对待其他事情的态度一样，对这本书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我的经纪人埃迪·贝尔 (Eddie Bell)，自始至终都鼓励我写这本书，并以他的聪明才智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时，马丁·雷德芬 (Martin Redfern) 和罗伯特·莱西 (Robert Lacey) 诚实正直和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使我铭感于心。他们的支持使我最终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这本书，他们在此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我还要感谢海伦·埃利斯 (Helen Ellis) 以及执行主管维基·巴恩斯利 (Vicky Barnsley)，因为虽然直到 2010 年 5 月底我才正式与之签订合约，但在这之前他就一直对这本书抱有真诚的期望。

迄今为止，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得到很多非常杰出的工作人员的支持，尤其是默里·格拉斯 (Maree Glass) 和她的丈夫尼克·戈尔德 (Nick Gold)。默里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助手，她几乎改善了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我还要感谢德里克·德雷珀 (Derek Draper)，从 1992 年我第一次参选下院议员以来，他经常激发我的灵感并激励我向上。

我还想在此感谢克莱夫·拉塞尔 (Clive Russell) 在 1997 年以前帮我摆脱了在下院任职时所遇到的困境，同时还要感谢萨拉·亨特 (Sarah Hunter) 在那次困境中也伸出援手；感谢乔·丹西 (Joe Dancey)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一直为我提供调查资料，应对媒体，并给予我全面的支持；感谢西蒙·莱瑟姆 (Simon Latham) 在 2010 年大选期间为我辛勤工作；感谢我在北爱尔兰事务办公室的特殊顾问帕特里克·戴蒙德 (Patrick Diamond)，他与罗杰·利德尔 (Roger Liddle) 从未停止过对我政治努力的鼓励及帮助；感谢我回归政府后在商务部的特殊顾问杰弗里·诺里斯 (Geoffrey Norris)，他是我非常得力的顾问。

我很感谢那些在唐宁街一起工作过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公务人员，不论是在托尼·布莱尔执政时还是在戈登·布朗执政时，他们始终对我非常礼貌并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希望他们能认为我对他们也有过同样的帮助。

我要向所有官员，无论是在私人办公室还是在机关部门里工作的官员

致谢并致敬，我很依赖他们的专业帮助，并且非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能够与英国的公务人员一起工作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很遗憾无法在此将我应该感谢的人都一一列举。然而，在此我还是要特别感谢1997年以来我的历任私人秘书——鲁珀特·赫克斯特 (Rupert Huxter)、安东尼·菲利普森 (Antony Phillipson)、尼克·佩里 (Nick Perry) 和理查德·埃布尔 (Richard Abel)。

在布鲁塞尔，除了本书中提到的人员以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其他的内阁成员：珀·豪高 (Per Haugaard)、彼得·希尔 (Peter Hill)、赫德·霍本 (Hiddo Houben)、雷纳特·尼古拉 (Renate Nikolay)、埃里克·彼得斯 (Eric Peters) 和凯瑟琳·文特 (Catherine Wendt)。还要感谢我的司机约翰尼·玛尔克比克 (Johnny Melkebeek) 以及我私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凯瑟琳·米克斯图雷 (Katherine Mixture) 和菲奥娜·基特森 (Fiona Kitson)。特别感谢我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演讲撰稿人斯蒂芬·亚当斯 (Stephen Adams)。感谢我在委员会时的行政助理贝弗莉·坦皮斯特 (Beverley Tempest)，她一直帮助我并和我原来在布鲁塞尔任职时的同事保持联系。

虽然我无法写出自1985年以来每一个我曾与之亲密工作过的工党成员，但是我对他们所取得成就的钦佩之情永留心中。在2010年的竞选期间，玛丽安娜·特里安 (Marianna Trian)、罗杰·贝克 (Roger Baker)、托斯滕·亨里克森-贝尔 (Torsten Henricson-Bell)、萨姆·怀特 (Sam White)、休·麦克米伦 (Sue McMillan)、玛丽·多尔蒂 (Mary Doherty) 以及约翰·斯托利德 (John Stolliday) 和他的媒体监督团队同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样都是工党的中流砥柱。马克·卢卡斯 (Mark Lucas) 则一如既往地制作选举视频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与我患难与共的朋友。我要感谢这些年来他们对我的特别关怀。其中包括：瓦希德·阿利 (Waheed Alli)、布丽奇特·布罗迪 (Bridget Brody)、彼得·布朗 (Peter Brown)、马修·弗洛伊德 (Matthew Freud)、菲利普·戈莱特 (Philip Goelet)、韦林·霍普金斯 (Waring Hopkins)、克里斯蒂娜·昂格 (Christina Ong)、詹姆斯·帕隆博 (James Palumbo)、伊夫林 (Evelyn)、琳恩·德·罗思柴尔德 (Lynn de Rothschild)、罗兰·拉德 (Roland Rudd)、丹尼斯·史蒂文森 (Den-

致
谢

nis Stevenson)、琳达·瓦奇娜 (Linda Wachner)、斯蒂芬 (Stephen) 和维基·韦格-普罗瑟 (Vicki Wegg-Prosser)。

在北爱尔兰任职期间以及在此之后的生活中，于众多负责保卫我的保安人员中，我尤其要感谢邓肯·约翰逊 (Duncan Johnson) 和米克·希金 (Mick Hickin)，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已故的亚历克·范德普尔 (Alec VanderPool) 和阿米·桑赫拉 (Ami Sanghera)，他们永远是最优秀的。

最后，我要感谢雷纳尔多 (Reinaldo) 和他的家人一直坚定不移地忠诚于我，感谢我的哥哥迈尔斯 (Miles) 以及他的妻子瓦莱丽 (Valerie)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我的哥哥迈尔斯总是包容我的缺点，一直都在支持和爱护我。他是我此生难得的朋友。

中文版前言

这是一本由英国政治家撰写的、主要关于英国以及英国政治的书，那么远在中国的读者是否会对此感兴趣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为之寻找答案。

与先后担任与继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一起，我成功地帮助英国的老牌政治组织实现了它的现代化，使之成为今日的“新工党”。在这个组织连续三届赢得大选、执掌政府的过程中，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过去这些年的起起伏伏中，我不仅是一个见证者，更是一个亲历其中的参与者。

本书英文原版之所以取名为《第三个人》^①，主要是因为尽管托尼·布莱尔以及其后的戈登·布朗相继成为工党领袖以及英国首相，但是我的影响力依旧持续地存在于幕后，有些时候甚至是在台前。英国政治，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一样，公共生活往往与个人的权力、影响交织在一起。本书正是关于我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中的故事。首先，始于英国；然后，作为资深政治家转战欧盟；最后，又回归英国。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尤其是我作为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经常到访中国的几年间，我有幸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和官员，其中的一些人更是成了我的朋友。在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中，有一点就是，尽管我们的政

^① 本书英文原版名为 *The Third Man*，中译本改名为《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译者注

治体制大异其趣，但是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活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同欧洲的政治一样，中国政治中也充满了个性差异、心理因素以及各种理念与争论。政治家们对其所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迁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此的应变是普世皆同的，而且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它们都是过去 20 多年的政治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讲述在面对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迁时，一个英国政党是如何探寻自我变革的意愿；如何摒弃陈规陋习，挣扎求存；如何做到既保存了自身的基本身份认同以及核心价值，同时又得以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免遭淘汰、成功地生存下来。

在结识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俩是极有天赋的政治家。工作上，他们夙夜在公；政治上，他们洞若观火。同时，他们还非常擅长与尚对工党政治家心存疑虑的人们进行沟通与交流。他们明白，工党必须赢得并且保持民众的信任。

在他们身边，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媒体、统战以及应对负面评论，也就是确保我们在报刊、电视以及电台新闻中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正面报道。这样的工作帮助我确立了自己作为英国“媒体顾问”（spin doctor）^① 第一人的声望。所谓“媒体顾问”，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够“修补”新闻报道或是撰写第二天的新闻头条的人。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从事这一工作往往要求具备很强的纪律性，而这一点无法确保我能够在己方阵营中一直受到欢迎。在许多方面，与说服执拗的政治记者们相比，改变党内己方成员们的态度明显要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费力。

因此，尽管本书主要描述的是我在英国以及布鲁塞尔的政治生活，但它所隐含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本书聚焦于两位闻名于世的全球顶级政治精英，然而英国以外的许多读者对于他们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以及影响力依旧知之甚少。与我的政治经历一样，上述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也是很具吸引力的政治研究样本：在从政的道路上，要如何才能成功，又有哪

^① 根据伊丽莎白·巴米勒（Elisabeth Bumiller）在 1984 年于《华盛顿邮报》所作的定义，“spin doctor”指的是“专门负责与记者倾谈和打交道的政治顾问，力图把自己分析和诠释事物及新闻的角度加诸传媒报道”。在西方现代竞选政治中，“spin doctor”特指竞选运动中所雇的媒体顾问或政治顾问，他们负责对候选人进行从演讲谈吐到穿着打扮的全方位包装，旨在保证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获得最佳宣传。——译者注

些或大或小的失败与挫折经验值得借鉴。

在我看来，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有着一种对改变与希望的渴求。在为工党运动而筚路蓝缕的岁月中，他们使我确信工党复兴指日可待。这并不是对权力本身的渴望，而是对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党的渴求，也只有这样一个工党，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相较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初期的英国更具人性、更加宽容、更加公正的国家。我们三个人情同手足，我们的人格力量以及我们所组建的职业政治家团队中的成员们所共同拥有的对于改变的渴望，将会帮助我们在大选中重新赢回执政地位，并且能够比工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执政时期都更加持久。

一路走来，我们成功地转变了工党对于经济、市场、防卫、商业、工会、税收收入与财政开支、公共事业改革以及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态度。通过这些转变，我们创造了“新工党”，使它得以与现代英国社会的主流融为一体。就政府而言，这一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宽容、更加开明的英国。这正是我们的政治遗产，也是我为之骄傲的我们共同的政治履历。我们赖以生存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基本服务都得以重建：“冬季危机”（winter crises）时汹涌的罢工工潮、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漫长的排队候诊、摇摇欲坠的校舍中的办公时光，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重症，例如癌症的快速治疗，拯救了许多生命，而 NHS 也实现了自其诞生以来最大程度上的“以患者为中心”。

我们对于中小学和大学史无前例的投入是与影响深远的旨在增加各个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受教育阶段早期的教育机会的改革相联系的。所有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也许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此努力地致力于将工党重新改造为英国民众所希望的那种执政党。在某些时候，本书也会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放在一些肥皂剧般的各种政治关系上，但是，本书的真正内容主要是关于我们塑造的这个国家与社会。

虽然我也有不少缺点，但我是一个忠诚、耿直的人，并视其高于一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过许多次只要我选择卑躬屈膝或是在合适的时机变换阵营，或许会有对我更有利的结果：假如我在戈登逼宫日紧、首相大位在望的时候，抛弃苦苦挣扎、即将下野的托尼，对我来说将大有裨益；假如我在此后戈登连任无望、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抛弃他，我也能赢得党内许多同志的赞许。或许，在这些情况下我都过于坚持原则、不懂变

通，没有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但是在我看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个错误。

在使我招致媒体批评的事件中，有一件是关于我的交友圈。我承认，我会被极具个性的人所吸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鲜明的个性让我觉得他们很值得交往。相比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我对于他们的所思所为更有兴趣。我评判他人的标准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不是社会对他们认可与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成功人士，无论他们身处政界、商界、传媒界、时尚界还是艺术界，都会散发出一种能量，都拥有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以及呼朋引伴、嘉宾满座的吸引力。我也乐此不疲，交游广阔，尤其是在政治圈外朋友众多。我无须为此道歉，我就是个生性好动的人。

与那些能够在政治中随波逐流的人不同，我并不是那种是非皆可的中立派。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哪一次我会放弃争取或是斗争，有时候我甚至会直接反击围攻我的嘈杂之声。当然，我也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想法，但绝不会遇事毫无主见。自从我步入政坛，我始终坚守着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归属于特定的政治派别。我属于政治中左派，但是我也一直对能够践行我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所有新颖方式持开放态度。我相信，理念的原则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在政治与政府事务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我看来，这正可用来描述在过去的20余年中，我在开展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时，所接触到的那些最具远见卓识的中国政治家。

很自然的，在本书中，中国所占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欧洲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是在布鲁塞尔担任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时开始本书的创作的，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从一个纯粹的国内政治家转而出任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这种转变迫使我必须迅速地将视野转向外部，尝试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

远离了伦敦的高压政治生态，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中国的崛起对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意义。我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治与政策事务的专家，同时，我也将自己在欧盟委员会中的角色部分地视为一个将中国介绍给欧洲受众的解说者。我深信，在很多方面，欧洲对于中国的反应，正是其自身对于全球化反应的翻版。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重塑了欧洲的经济与市

场，而这些改变让我们变得紧张。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正面的，这是建设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所在。此类观点在本书英文版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我为中文版新添了整整一个章节，以便更加细致地展开描述。我希望对于阅读这本书的中文读者而言，我的故事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的思考。

目 录

-  第1章 出身于工党 /001
-  第2章 辉煌的失败 /029
-  第3章 三剑客 /061
-  第4章 左右为难的选择 /087
-  第5章 做最好的彼得 /110
-  第6章 被解雇 /130
-  第7章 战斗，而不是放弃 /158
-  第8章 重返影子内阁 /179
-  第9章 贸易之所 /188

拯救工党

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



第 10 章 东山再起 /218



第 11 章 新工党的终结? /247



第 12 章 来自中国的挑战 /290

第 1 章

出身于工党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比格伍德对于我来说要比现在大得多。从家门前走 3 分钟就能到达路的尽头，路的另一端则是一片更为广袤的绿地，一直延伸到汉普斯特德希思，绿地环绕着汉普斯特德公园郊区。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前 20 年的美好时光。

我们所说的郊区，是一个叫做达姆·亨利埃塔·巴尼特（Dame Henrietta Barnett）的基督教社会改革者建立的。他一直坚信带有村庄气息的混合社区将软化并最终消除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敌意。郊区比不上汉普斯特德的富裕发达，它位于离伦敦中心 1~2 英里的一个陡峭的斜坡上。在郊区规划的规则下，房屋院落之间只是用灌木丛隔开，没有围栏和围墙，在其管辖范围内没有商店，也没有酒吧。这里道路宽广，灌木丛生，春天四处都开满了白色、粉红色和紫色的花，是人们散步、仰望天空、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郊区无疑都是个理想之地。作为一个小孩子，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但当我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认为它有点狭小，所以对它的热情有过短暂的消减，不过后来我又重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位于伦敦，但是又不尽然。

然而，它却是伦敦工党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汉普斯特德是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和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这样的名人的住所，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杰出人物，如尊贵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他们就住在附近，并且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两个儿子——罗宾（Robin）和贾尔斯（Giles），比我

和我哥哥迈尔斯稍大。当我到了可以参加当地幼年童子军的年龄时，玛丽好心地把贾尔斯的有点旧的幼年童子军运动衫送给了我。我早期的关于政治的鲜活记忆是在我 11 岁生日前几天开始的，那是在 1964 年大选后，我看着威尔逊一家穿过一大群摄像师和记者，甚至还包括著名的美国广播公司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工作人员，动身前往唐宁街。

一年后，威尔逊一家邀请我们去唐宁街 10 号的观看行军旗敬礼分列式。也许我说当我睁大双眼穿过那扇著名的黑色大门时，我在想象着 45 年后在另外一位工党首相的陪同下，我会作为一个资深的大臣来观看同样的仪式，会显得很荒唐，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场景的确让我很眩晕。哈罗德的政治秘书马西娅·威廉斯（Marcia Williams）甚至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了内阁会议室，并让我在首相的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我当时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并且意识到这种感觉与我的家庭和工党的渊源有一定关系。我的母亲是我的外祖父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唯一的儿子，我的外祖父是伦敦工党秘书长的创建者，于 1929 年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的大臣，并且是 20 世纪 30 年代伦敦郡议会的第一个工党领导人。他在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担任内政大臣，并且是 1945 年竞选时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幕后组织力量，在获胜后担任副首相。后来他又在阿特利政府担任外交大臣。



1939 年，外祖父赫伯特·莫里森在海德公园的五月游行上。

虽然我的母亲对于驱动政治的相关问题十分关心和热衷，但是政治一直主导着外祖父的生活，使外祖父忽视了母亲的成长，这一经历使母亲一

生都不喜欢暴露的公众生活。而我父亲与工党的联系并非源于家族关系。与母亲不同，他对政客非常着迷，同时对于他们忙碌的生活和围绕他们的话题也很感兴趣，甚至对围绕在政客身边的人都非常好奇。他和马西娅·威廉斯是好朋友，并且和安静、淡泊的玛丽·威尔逊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每当我与玛丽相见时，她都会回忆起他们的友情。

父亲的政治出发点非常传统，是典型的老工党政治。也许这部分是因为父亲的理念是在战后形成的，那时工党和保守党的分歧比现在更突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基因。他出生在平纳（Pinner），一个伦敦郊外的并非以政治闻名的地方，但他的家族是起源于19世纪波兰的犹太人社区，然后又遭受俄国的统治。据说他的曾祖父内森（Nathan）曾经被卷入反沙皇的活动，并在特工逮捕他之前逃走了。有人可能会认为我的父亲继承了内森的反叛血统和犹太人的活跃精神，我却不以为然。他从来没有隐藏过他的犹太人血统，事实上，他也根本无法隐藏。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报纸——《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的广告经理，大部分的工作生活都惊人地顺利，而且他酷爱交友，并且深受人们的欢迎。他并不是个信徒，我从没见他去过犹太教堂，即使是最近的犹太教堂，甚至是在犹太教的新年时他都没去过。当然，他更没有带我去过。宗教从来都不会出现在我们晚餐后的讨论中，相反，政治却是我们永恒的话题。



父母与祖父